

ZHONG GUO GU DAI MING JIA ZUO PIN CONG SHU

REN BONIAN

上册

任伯年

中国
古代
名家
作

品
丛
书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ZHONG GUO GU DAI MING JIA ZUO PIN CONG SHU

REN BONIAN

上册

任伯年

中国
古代
名家
作品

丛书

人民
艺术
出版
社



任伯年
(1840-1895)

任伯年其人其艺

王靖宪

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的鸦片战争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。鸦片战争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“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，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，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，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；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，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。”^①位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，就在这一时期中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个典型城市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上海由一个小县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。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，在鸦片战争以前，来自闽、粤、浙、鲁、辽沿海诸省及东南亚的船舶，由吴淞口进入上海，当时黄浦江上已是“舳舻尾衔，帆樯如栉”，各地商贾云集的商埠。鸦片战争以后，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清政府跟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作通商口岸，随着列强的侵入，帝国主义为了便于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欺凌，开辟租界，上海又成为销售鸦片、洋货的集散地。这时上海除了官僚、地主、洋行买办外，经营各种商品的商业资本家，开办钱庄的金融资本家，以及各行的手工业者、工人大量地涌至上海。在太平天国革命大风暴过后，19世纪七八十

年代进入相对稳定的年代，给上海带来空前的繁荣，于是上海的画坛也随着兴旺起来。原来集中在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地的画家，为了生活也都转移到上海。张鸣珂在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中说：

自海禁一开，贸易之盛，无过上海一隅，而以砚田为生者，亦皆于于而来，侨居卖画。

于是绘画作品进入钱庄、当铺、商店和商贾的住宅，在当时一个商人手头有一把画扇引以为荣。“盖经商者皆思得一扇，出入怀袖以为荣也。”“一时走币相乞，得其寸缣尺幅，无不珍如球璧。”（均见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）绘画不再是封建地主及其士大夫所垄断的艺术品，商贾、市民成了绘画的占有者。在短短的几十年中，画家在上海艺坛中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。如果我们翻开杨逸的《海上墨林》，可见当时画坛的盛况。他们根据买画者的需要，以新颖的画法和审美趣味，彼此影响，互为风气，占据了原来被封建士大夫所占据的艺术领域，给中国绘画史写下了新的一页。在这些众多的画家中，其佼佼者当为任伯年。

—

山阴行者真古狂，下笔力重金鼎扛。
忍饥惯食东坡砚，画水直翦吴淞江。
定把奇书闭户读，敢握寸莛洪钟撞。
海风欲卷怒涛人，瑶琴壁上鸣琤琮。

——吴昌硕《十二友诗·任伯年颐》^②

任伯年虽然是生活在近百年的一位著名画家，要了解他的

一生却不是很容易的事，大概是因为他不入文人之列，所以同时代人记载他的事迹很少。如果有一点也是一鳞半爪，又多属传闻，其真实性如何，亦无从证实。画家徐悲鸿极喜爱任伯年的绘画，为了写一篇简短的评传，他走访了任伯年的儿子任堇叔，及其亲戚、朋友、学生，但搜集到的资料并不多。近年来谈任伯年的文章已不少，但直接涉及任伯年生平的却也不多，现在只能就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，对任伯年其人的一生作一钩稽。

任伯年名颐，原名小属；一说初名润^③，字伯年，号次远。据说早年曾师法费晓楼的仕女画，故自称“小楼”^④，他的号镌诸印章和题画的有：任千秋、任公子、任和尚、山阴道人、山阴道上行者等。其斋名有“不舍”、“颐颐草堂”、“雁斋”、“倚鹤轩”、“闲闲草堂”等。祖籍浙江山阴，后迁居萧山^⑤。生于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。^⑥

任伯年小时候家境不很富裕，父亲名鹤声，号淞云。原是民间写真画工，后在萧山开了一爿米店。道光年间，由于连遭灾荒，他的米生意并不怎么好。其中一些情况，任堇叔在《任淞云先生像》的题跋中说：

先王父讳鹤声，号淞云。读书不苟仕宦，设临街肆，且读且贾。善画，尤长写真术，耻以术炫，故鲜知者。垂老，值岁歉，乃以术授先处士。

徐悲鸿《任伯年评传》说：

其父能画像，从山阴迁萧山，业米商。伯年生于洪杨革命以前（1839年），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。

大概任伯年的父亲任鹤声到萧山开米店时，“耻以术炫”就不画肖像画了，所以很少人知道他是个画肖像画的画工。任伯年小时候是怎样度过的，没有什么资料记载，任董叔说，他曾随父亲学画。可能是由于荒年，感到米生意没有可靠的保证，还是把自己的写真技术传授给儿子，以便将来有个谋生的职业。这就是任董叔所说的“值岁歉，乃以术授先处士”。

当任伯年21岁时，即1860年，太平天国军队进军浙江杭州，次年从萧山进取绍兴。在战争中，他的家庭遭到破坏，父亲在战乱中去世。这时任伯年正当青年，在逃难中被卷入太平军。这一段情况，任董叔有过叙述：

赭军陷浙，窜越州时，先王母已殁。乃迫先处士使趣行，已独留守。既而赭军至，乃诡丐者，服金钏□□。先期逃免，求庇诸暨包村。村据形势，包立身奉五斗米道，屡创赭军，遐迹麇至。先王父有女甥嫁包村，颇任以财，故往依之，中途遇害卒。

任伯年的母亲在他21岁前就已去世，他的父亲是在逃难到诸暨包村途中死去的。在太平天国军队未到萧山前，任伯年就先行逃走，大概在逃走的途中遇到太平军，因此被卷入太平军中。任董叔说：

先处士少值俭岁，年十六陷洪杨，大酋令掌军旗。旗以纵表二丈之帛，连数端为之，贯如儿臂之干，傅以风力，数百斤物矣。战时麾之，以为前驱。既馁，植干于地，度其风色何向，乃反风跌坐，隐以自障。敌阵弹丸挟风嗤嗤，汰旗掠鬓，或缘干坠。坠处触石，犹能杀人。尝一弹猝至，

撼旁坐者额，血濡缕，立殪。先处士顾无恙，军行或野次，草块枕藉，露宿达晨，羸粮蓐食，则群踞如蹲鸱，此岭表俗也。⑦

这段记载虽具体而生动，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：其一，文中记述任伯年“年十六陷洪杨”，这和太平军进取萧山、绍兴的时间不合。太平军进取浙江萧山、绍兴是1861年11月，这一年任伯年已22岁，不是16岁。其二，徐悲鸿《任伯年评传》是访问任董叔后写成，为什么传中只字不提任伯年“陷洪杨”这段历史，反而说：“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，迨父卒（伯年约15岁），即转徙上海。”如果说当时任董叔没有和徐悲鸿谈起任伯年“陷洪杨”的历史，所以未写入评传。但《任伯年评传》写于1950年冬，而任董叔的题跋发表于1928年8月，徐悲鸿是非常留意任伯年的生平资料的，任董叔这段题跋他不会不知道。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有人认为：任伯年逝世时，任董叔才15岁，当他写题跋时已隔32年，容易有记忆的错误。这一推测是有其可能性，但无坚实的旁证。关于第二个问题，尚未见有人辩论，大概是不相信徐悲鸿所说15岁转徙上海的事实。我认为这问题是与任伯年受知遇于任渭长的事有关。因为“陷洪杨军”和在上海遇见任渭长，据记载都发生在任伯年十五六岁，在这一两年间发生两件事，时间上有矛盾，徐悲鸿是相信任伯年15岁到上海遇见任渭长，所以将这件事写入《任伯年评传》；他不相信16岁陷入太平军，但他对这两件事都没有作确切的考证。任伯年身“陷洪杨军”，是出于任董叔的记载，而且叙述具体而细微，可能是小时候听他父亲谈过。同时任鹤声的死，也由于这次战

乱，两事相合，有它的可靠性。而任董叔也没有必要去虚构这个故事。任董叔在《任淞云先生像》上题跋，比较详细叙述了太平军进浙江时，任伯年逃难和任鹤声遇害，以及后来任伯年寻找其父尸体的经过：

难平，先处士求其尸，不获。女甥之夫识其淡巴菘菸具为志，志其处。道往，果得之，□钏宛然，作两龙相纠缠，犹先王父手泽也。

这一记载更说明任伯年曾身“陷洪杨军”的事不会出于虚构。此外《墨林挹秀录》中任董叔小传也可作为旁证。林文举、丁健行《墨林挹秀录》转录《匏籥杂志》说：

董叔生于洪杨乱后，家业荡然，伯年以鬻画贍家，课董叔读，聪颖异常儿。髫龄尝画两军对垒图，为伯年斥责，盖其父饱经刀兵丧乱之苦，不忍画见黜武之事也。

这条记载可作为任伯年曾“陷洪杨”的旁证，任伯年在22岁时由于逃难，可能在途中被卷入太平军一段时间，在军中曾撑过大旗。至于有的文章仅据任董叔的题跋，因此得出：“年轻的任伯年，毅然投奔太平军……站在革命的最前线”，恐怕与任董叔所记“陷洪杨军”的原意似有出入；从任董叔的记叙来看，任伯年入太平军不一定是自愿去参加的。

长期以来上海画坛上流行一则任伯年和任渭长的故事。如方若《海上画语》（稿本）说：

（任伯年）书画酷似渭长，渭长尔时已得名，伯年方抵沪，设摊石路夜市，陈画多渭长款。一日，渭长经过，注视良久，询是画作者于汝何称？曰：阿叔。渭长笑曰：不

敢当，我即渭长，未曾作此。伯年大窘，曰：实不相瞒，我作也。渭长曰：画甚佳，何冒人为？复询寓处，别去。次日，致书胡公寿，胡为钱业公会所礼聘，扬誉自易为力，且代觅“古香室笈扇店”，安设笔砚。不数年画名大噪。^⑧徐悲鸿《任伯年评传》也记载这一故事，内容稍异：

迨父卒（伯年年约十五六岁），即转徙上海。是时任渭长有大名于南中，伯年以谋食之故，自画折扇多面，伪书渭长款，置于街头地上售之，而自守于旁。渭长适偶行遇之，细审冒己名之画实佳，心窃异之，猝然问曰：“此扇是谁所画？”伯年答曰：“任渭长所画。”又问曰：“任渭长是汝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是我爷叔。”又追问曰：“你认识他否？”伯年心知不妙，忸怩答曰：“你要买就买去，不要买即算了，何必寻根究底！”渭长夷然曰：“我要问此扇究竟是谁所画。”伯年曰：“两角钱哪里买得到真的任渭长的画扇。”渭长乃曰：“你究竟认识任渭长否？”伯年愕然无语。渭长乃曰：“我就是任渭长。”伯年羞愧无地自容，默然不作一声。渭长曰：“不要紧，但我必欲知这些究谁所画。”伯年局促答曰：“是我自己画的，聊资糊口而已。”渭长因问：“童何姓？”答曰：“姓任，习闻当年父亲常谈渭长之画，且是伯叔辈，及来沪，又知先生大名，故画扇伪托先生之名，赚钱度日。”渭长问：“汝父何在？”答曰：“已故。”问：“汝真喜欢作画否？”伯年首肯。渭长曰：“让汝随我们学画如何？”伯年大喜，谓：“穷奈何？”渭长乃令其赴苏州，从其弟阜长居，且遂习画。

这二则记载细节虽然有些小异，但故事情节大体相同。此外，画家陈半丁也记述过这个故事。^⑨方若在清末曾向上海画家舒浩学过画，并在上海卖过画，了解画坛的掌故，他写《海上画语》记载了这个故事，看来不会是他自己杜撰的。徐悲鸿这则记载，说是：“二十年前王一亭翁为余言者。一亭自言：早岁习商，居近一裱画肆，因得常见伯年画而爱之，辄仿其作。一日为伯年所见而喜，蒙其奖誉，遂自述私淑之诚，伯年纳为弟子焉。”可见徐悲鸿的记载也是有来源的。陈半丁说他所谈的：“多数是吴昌硕和我谈起的，我和吴老相处的时间比较长。”由此可见任渭长路遇任伯年的故事，广泛流传在上海画家之中。它和任渭长受知镇海名士姚梅伯^⑩的故事相似，广为人们所称道。所以方若在《药老人卖画自嘲诗》中将这两个故事一并赞诵：

山阴苦况人尝说，石路黄昏卖画还。佑圣观前同样事，
大梅始识任萧山。

任伯年受知任渭长的事，虽然广被人们所传诵，是否实有其事，不少人表示怀疑。怀疑的理由是：据《萧山任氏家乘》记载，任熊（渭长）卒于咸丰丁巳（1857年），年35岁。这一年任伯年18岁，这就是说任伯年见到任渭长，只能在这一年以前，可是目前尚未发现任伯年18岁前在上海的资料。徐悲鸿说“迨父卒（伯年约十五六岁），即转徙上海”，但没有旁的材料可证明任伯年十五六岁去上海。有人推测任伯年不一定在上海遇到任渭长，可能在萧山或宁波；也有人猜测任伯年不是遇见任渭长而是任阜长，由于传闻而误记了。这些仅仅是一种推测，没有材料根据。关于任伯年受知于任渭长的故事，虽然流传很广，始终是

个悬案。在没有更充足的材料发现以前，我们姑且将这个故事照录在这里，以为存疑，留待新的资料发现来作结论。

同治四年(1865年)，任伯年26岁，开始在甬上(即宁波)卖画。宁波在清末是商业比较繁荣的商埠，它有甬江直通海洋，离上海很近，它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。任渭长也曾在这里卖过画。任伯年在宁波住了4年，同治七年(1868年)二月，他在将要离开宁波去苏州的时候，画了一幅《东津话别图》，并在题跋中记述他和任薰(阜长)去苏州，朋友们来送别的情形。题跋还记述在宁波交游的情况：

客游甬上已阅四年，万丈个亭及朵峰诸君子，一见均如旧识，宵篝灯，雨戴笠，琴歌酒赋，探胜寻幽，相赏无虚日。江山之助，友生之乐，斯游洵不负矣。兹将随叔阜长兼笔游金阊，廉始亦计偕北上。行有日矣，朵峰抱江淹赋别之悲，触王粲登楼之思，爰写此图，以志星萍之感。同治七年二月花朝后十日，山阴任颐次远甫倚装画并记于甘溪寓次。

图中画陈朵峰、谢廉始、万个亭、任阜长和任伯年五人，在宁波东门外甬江岸上送别的情形。

从图中题记看，这时任伯年已与任阜长相识，并以叔侄相称。任伯年和任阜长什么时候相识，是通过什么关系认识的，现在都无材料可以考查。在宁波期间，任伯年和任阜长已时相过从，也肯定在这段期间向任阜长学画。流传任伯年早期的作品，和任渭长兄弟的画风非常接近，这时任伯年也肯定临摹过任渭长的作品，任渭长曾馆于姚梅伯家，留在宁波的作品不在少数。

关于任渭长在宁波，《海上画语》曾说：

任渭长熊，萧山人，画直登老莲之堂，而入老莲之室。自幼喜涂抹，从张雅堂夫子读，偶检其书包布下，皆画稿耳。发乱作，避难山中，憩于古庙，拾炭屑绘中途所见，无不历历，天才也。乱后无可谋生，鬻画甬上，鲜人过问，镇海姚梅伯燮，适在甬养痾佑圣观，遇而叹赏，馆于大梅山馆。^①

任渭长先在宁波卖画，后在姚燮家画画，他曾给姚燮的诗精心制作了《大梅山馆诗意图》120幅。他自己在画后题道：

橐笔明州（宁波），下榻姚氏大梅山馆，与主人复庄订金石交，余爱复庄诗，与复庄爱余画，若水乳之交融也。暇时复庄摘其句，属余为之图，晨起赋色，阅二月得百有二十页。

任渭长曾在宁波卖过画，他留在当地的作品一定不少。这时任伯年可能由于其弟阜长的关系和姚燮相识，并住在姚家，任伯年的《小浹江话别图》就是作于大梅山馆之琴咏楼中（见题记）。任伯年在姚家一定会见到120幅的《大梅山馆诗意图》，他也可能临摹过任渭长的不少作品。任伯年在这时期学习到二任的不少画法，所以他的早年创作和二任的作品非常接近。

任伯年在宁波期间曾去镇海，并在镇海方樵龄家住了半年。马衡在题任伯年《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》中说：

伯年之初鬻画也，尝主镇海方樵龄家。樵龄家之尊人本好客，优礼之，伯年亦不言谢，半年后将辞去……

镇海在甬江口上，有招宝山，形势险要，风景幽美。姚燮又是

镇海人，是个老名士，又能诗词书画。任伯年在镇海和他们交往，对他的艺术获益匪浅。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年初，任伯年还游了一次杭州。在杭州住在陈延庵家，曾作《紫阳纪游图》，记下他与陈延庵同游杭州紫阳山的游踪（见《紫阳纪游图》题记）。他在陈延庵家得识香波（香波姓和生平无考），并为他画了《灵石旅舍图》，香波在题跋中记述了这段交往：

丁卯春，予客郡中，适陈氏延庵□□，画士任伯年下榻二雨草堂，昕夕过从，遂订交焉。曾为余作《灵石旅舍图》，其用笔秀逸，设色古雅，不让老莲。是帧为赠别而作，颊上添毫，栩栩欲活。

流传下来任伯年的作品，最早是作于宁波卖画这段时间。有年款的如《玉楼人醉杏花天》，作于同治四年夏；作于同治五年的有《小浹江话别图》、《梅花仕女图》、《二十四孝图》；作于同治六年的有《风尘三侠图》、《周闲像》、《摹陈老莲人物》；作于同治七年的有《斗梅图》、《东津话别图》。这些都是任伯年最早时期的作品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春二月，任伯年随任阜长离开宁波乘船到苏州。在苏州仍以卖画为生。在苏州时任伯年通过任阜长认识了当时在苏州的画家沙馥、胡公寿等。沙馥即沙三春，在画坛已有一定名气，他的兄弟沙英（字子春）是任渭长的弟子，“渭长未竟之作，子春完成之，能尽师法。”（见《海上画语》）胡公寿（1823—1886年）名远，号横云山民，当时在苏沪画界已负盛名。吴昌硕《石交录》（传抄本）说：“流寓海上，书画

雄一时。”苏州的文化要比宁波兴盛，任伯年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使他在绘画上有更多的相互切磋的机会。

任伯年在苏州大概以作肖像画获名于同道之中，他在苏州短短几个月画了许多肖像画。如《佩秋夫人三十八岁小像》、《沙馥三十九岁小像》、《任薰像》、《横云山民行乞图》、《胡公寿夫人像》、《榴生小像》等。胡公寿还为任伯年一些肖像画补景，以胡公寿的名气，给他小17岁的青年画家补景，可见胡公寿对任伯年的器重。

任伯年在苏州没住多久，在同一年冬天离开苏州到上海卖画。[按《沙馥三十九岁小像》题作于：同治戊辰（七年）冬孟，任颐伯年于苏台寓斋。《陈允升像》题作于：同治戊辰冬仲甫于海上寓斋。可见这年仲冬任伯年离苏至沪。]他初到上海人地生疏，境况并不很好。陈蝶野在《任伯年百年纪念册》序言中说：

先生初至沪滨，署名小楼，居豫园极不得志，日至春风楼品茗。

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也说：

任伯年……画法超妙，顾其初不著名。游于沪，为北门外某扇铺佐经纪，月得钱数千文。

但任伯年到上海不久，胡公寿便将他的画推荐给笺扇店，并为他誉扬，没有多久就誉满上海画坛。《海上画语》说：

胡（公寿）为钱业公会所礼聘，扬誉自易为力，且代覓“古香室笺扇店”，安设笔砚，不数年画名大噪。

任伯年得到胡公寿的帮助，使他后来成为上海著名的大画家，

这大概是事实。从任伯年许多作品题识来看，他差不多每年12月都要到“古香室”作一批画，很可能是借以表示知遇之恩。胡公寿曾命自己的斋名为“寄鹤轩”，而任伯年则名自己斋名为“倚鹤轩”，其中也不无寓意。同时《海上画语》也说：“伯年不忘知遇，称胡公寿为公寿先生。”胡公寿和任伯年的友谊一直很好，他们经常合作书画。如光绪八年(1882年)二人合作《蕙兰图》，胡公寿题诗云：

蕙与兰同体，因此臭味同，常为君子佩，品列楚骚中。

人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室，坐久不闻香，清风更萧瑟。壬午大暑节，任伯年写蕙，公寿补兰石并题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年)，他们二人又合作《天竹图》、《鹰石图》。《任伯年评传》说：

伯年学成，仍之沪，名初不著，有人劝其纳贲，拜当时负声望之老画家张子祥熊。张故写花鸟，以人品高洁，为人所重，见伯年画大奇之，乃广为延誉。不久，伯年名大噪。这段记载说明曾替任伯年扬誉的还有张熊。张熊(1803—1886年)字子祥，别号鸳湖外史。他很早就在上海卖画，并出版有画谱，影响很大。他山水花卉都能，书法宗黄庭坚，收藏丰富，其斋名为“银藤花馆”，入其室彝鼎卷轴，触目皆是。任伯年曾为他画70岁小像《蕉林道暑图》。他对任伯年的画非常称奇，他为任伯年扬誉也是可能的。

任伯年成名后，从此长住上海以卖画为生活，这期间偶尔短期去苏州。自同治七年(1868年)冬直至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冬去世，计在上海居住28年。

任伯年在上海的交往除胡公寿、张子祥外，他还结识了陈允升、虚谷、杨伯润、高邕之、蒲作英、杨岷、胡璋、吴昌硕等著名书画家。他们在书画上互相切磋，非常相得。陈允升工山水，出版有《纽斋画牋》，任伯年曾为陈允升画过肖像。虚谷（1824—1896年）年长任伯年16岁，任伯年曾和虚谷合作画《咏之先生五十岁早朝图》，由虚谷画像，任伯年补景，时为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任伯年到上海后第三年。任伯年还给虚谷画过像及扇面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任伯年和虚谷、胡璋合作《松竹梅图》，虚谷还为任伯年作《山阴草堂图》。任伯年去世，虚谷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挽联：

笔无常法，别出新机，君艺称极也；

天夺斯人，谁能继起，吾道其衰乎。

杨岷字庸斋，号藐翁，归安人，是著名书法家，他和吴昌硕交谊在师友之间。任伯年曾为其作69岁小像。杨伯润字佩甫，号南湖外史，浙江嘉兴人。他是“咸丰之季避乱来沪，鬻画养母。其画初尚浓厚，中年后造诣精深，渐归平淡，雅秀之气，为诸家所莫及”。（见《海上画语》）任伯年为姜石农孙画《神婴图》，由杨伯润题识。又为陈曼寿及其女画《授诗图》，也由杨伯润题识。高邕之字邕之，浙江仁和人。书法学唐李邕，因此以“李龠”为号。曾得《泰山刻石》29字拓本，名其居为“泰山残石楼”，楼中收藏石涛和八大山人作品极为丰富，并印有《泰山残石楼藏画集》。任伯年经常到他家观赏、临摹，有时径直在他家里作画。高邕之比任伯年小10岁，两人的友谊却极为深密。《海上画语》记述一则故事：